

沈文凡◎著

唐代韵文研究

韵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贯穿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

而唐代则是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唐代韵文在于音节之美，

吟诵铿锵有致或委婉悠扬的音调，感受韵文的美妙韵律，并借由古体诗和

近体诗（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古、七古等等）分析其体

如艺术形式与艺术风貌，挖掘各种类型韵文的题材内涵与呈现的思想意蕴，

如咏史怀古、山水田园、婚姻爱情等，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唐代韵文研究》将从探讨唐代韵文的独特特质、演变规律与轨迹，

辑考唐代韵文之宋元明清与东亚汉诗接受史文献，

揭示唐代韵文的艺术风貌，

挖掘唐代韵文的主题思想等多方面展开。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一

唐代古文研究

唐代古文研究



卷一

沈文凡◎著

唐代韵文研究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韵文研究 / 沈文凡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43-2752-6

I. ①唐… II. ①沈… III. ①韵文—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5204号

唐代韵文研究

作 者 沈文凡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n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天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752-6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余恕诚

我与文凡的师生缘分至今已近三十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凡考入安徽师范大学，跟随宛敏灏先生、刘学锴先生和我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我们教学点的硕士招入门下后，要将这届学生培养三年，至其毕业后方再招新生，因此三年的朝夕相处使我对文凡颇为了解，他的学术生涯亦从此起步。

他对唐代韵文，尤其是唐代诗歌非常爱好，在阅读和研究中有着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选择了大历诗人韦应物作为研究对象，韦诗高雅闲澹，不易把握，文凡在对其思想和艺术的特异性研究上下了一番苦工，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底、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深获好评。1988 年，文凡毕业，到吉林大学文学院任教，在学界渐渐崭露头角。2000 年，他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在霍松林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荣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近些年来，文凡任吉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在相关学术团体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国际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李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韩愈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等职，还兼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国庆山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学院客座研究员。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体现了很强的学术进取精神和研究能力，在唐代韵文的题材、艺术、学术史和批评论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受到学界推重。

学术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推进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亦随之不断变化，文凡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变化，在其学术研究理论上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发展和进步的印记，他的学术方向和研究方法能够不断调整和更新，高瞻远视，发人所未发，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阵地，他在唐代韵文文献和题材艺术研究上为后学指踪发迹。他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格局始终是多元而开放的，他是学界首位从事唐诗题材研究和排律文献文研究的学者，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题材研究中既有文献的功底、理论的深度，又能兼具思想的锋芒；在排律研究中能够熟练运用文献辑佚和考据的功夫来为诗歌思想和艺术的研究服务。

文凡的学术研究，实现了史料文献研究与理论阐释相结合，文献研究与文体研究相结合，其唐代韵文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彼此支撑，加强和深化了内部研究。他在唐代韵文理论研究、艺术规律的探索、唐宋诗词发展史的阐释、唐宋诗批评学的研究领域内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其一，创造性的题材研究。文凡在学界率先提出唐宋诗分题材研究的构想，他对于具有社会学和美学意义的唐宋诗歌题材研究进行深入思考，关注唐宋诗歌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力图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题材的梳理寻绎，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其研究视角转换与研究对象的开拓，对唐宋诗歌研究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文凡的题材研究以思想内容与文化史研究为主，涉及射猎、应制、东北边塞诗、闺怨诗、悼亡诗、鬼诗、寿词、考古诗等题材。他关注唐代帝王诗歌创作中的边塞诗歌和诗史地位，客观评价其对于唐代诗坛，尤其是初唐和盛唐诗坛的正面影响，阐发唐太宗等人的文学政策和诗歌实践，重新审视其文学史价值和文体贡献在文化研究上注重特异与沿革。文凡的题材思想研究不做“过度诠释”，力避穿凿附会，尽量从大处让作品的意义在广阔的阐释

空间释放出来。

他的研究往往围绕“文化与诗歌”或“诗歌与文化”来展开，他在这种研究中真正深入到了诗歌的相关材料中去。他关注大的时代环境、具体的时事和人事背景以及文化诸因素所构成的背景，除了政治、历史和社会之外，他还关注民族、地域、科举、礼仪、风俗、婚制、家族、哲学、美术、音乐、传播、生态、物候等对题材思想的影响。

其二，深透性的艺术研究。文凡的唐代韵文艺术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本体研究，他继承了传统的唐宋诗词艺术研究中的精髓，又吸收西方新知，抓住有关问题，力求深入透彻地作出中肯的分析。注重分析，写成较为系统深入的文字，关于诗词的语言意象、章法结构、赋比兴手法、作家、流派、体式，以及各时段的风貌特征、渊源、影响等，都有涉及。唐代韵文他将重点放在中晚唐诗人身上，关注杜甫、韦应物、白居易、韩愈、温庭筠等人创作的艺术风貌与创新。论及反映时事诗歌新闻属性和传播性颇能显示其眼光的敏锐和理论上的创新性，其中的一些观点被广泛评论和征引。这些论述，既有发挥前人之说，或采用前代诗评、诗话的资源，又吸收了西方的鉴赏与批评理论，具有现代的眼光与注重逻辑思维的特点。

其三，开拓性的唐诗文献研究。由于史的观念和横向联系意识的增强，文凡的文献研究的自觉性、思想性、综合性也相应地增强。他的唐诗文献学研究在荒原中开出新路，以通达的眼光将文体学与文献学结合，从文体学的角度开展诗歌艺术研究，进行纵向、历时性的接受史考察，以排律为切入点，以宏大的架构、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证、朴健的文风为唐代文学研究开疆拓土，填补了排律研究的空白，是排律文献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在这项研究中，他发掘和利用材料较以往广泛，最先将域外文献、诗话与唐诗接受研究相结合，在东亚汉诗的文献整理、艺术研究和接受研究上开辟新路，并为后来学者指示丰富翔实的资料源头，其学术眼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肯定。

其四，系统性的学术史研究。他具有通观的眼光，关注韵文研究和文学

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在有关论文中整理回顾了重要的唐诗诗人的研究情况；综述了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研究等主要成果；分析了唐代诗人的研究现状，科学而系统地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评述中体现的是理性认知，并努力寻找新的研究规律、方法，力图有助于拓展研究范围。这些具有学术史性质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和征引。

《唐代韵文研究》将纵向史的发展观念与横向的各种文化、文学乃至文体因素联系起来，形成纵横交错的格局。他的研究对象就作家而言，涉及唐宋两代的李白、杜甫、王维、韦应物、白居易、韩愈、元稹、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温庭筠、朱敦儒、方岳、彭汝砺等人，亦涵盖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等富于个性的帝王诗人。他在研究上有意识地将多方面加以沟通，将研究对象放置于特定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考察，关注诗体演变过程中，受诗人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的影响下所出现的变化。理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

《唐代韵文研究》注重各方面的贯通性。文学以语言为载体，本质是复杂的审美活动，文学艺术的表现，牵扯到多方面。文学研究中必然涉及风格、意象、词语、音韵等多种层面，除文体自身因素外，还涉及美学、语言学、音乐等多方面。为了从理论上能圆满地将一些问题说清楚，他除了运用中国古代文论、诗话中的资料外，还援引了外国的文艺理论与相关文献材料“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总之，文凡以多元视野、多种方法审视古典文学，“旁推交通”，并在更高层次上予以科学阐释。

他的学术研究能够注重本体研究与多元化研究的辩证关系。在研究中能够用辩证的眼光来对待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既注重对文学内部规律、现象，特别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结构与艺术的研究，又关注文本以外的背景研究。他重视创作与“社会条件”之间存在着的复杂的多层的关系，认为研究作家作品，是不可能与这多层关系彻底剥离开。我认为文凡的背景研究与

本体研究并重，走的是一条宽广通达之路。

他对唐代韵文的整体研究与终极目标有一份关怀，且多方面并重，彼此自觉地互相配合，便无疑大大有助于他向终极目标速度的推进。

余恕诚

甲午年元月廿九日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

前 言

1. 初唐诗坛概况

我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是指唐代开国至唐玄宗开元以前（618—711）这一时期。历时93年。这是盛唐诗歌繁荣的一个酝酿准备时期。这种酝酿准备，表现在诗歌体制的逐渐成熟完备，诗歌声律对偶的发展上，也表现在诗歌题材的开拓和刚健清新诗风的形成上。

初唐前期，诗坛基本上仍为齐梁浮艳空虚的形式主义诗风所笼罩。形式上在对仗、声律方面有所发展。唐高宗时上官仪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自觉地、刻意地讲求“六对”、“八对”，把诗歌的对偶归纳为各种对仗，对律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由隋入唐的王绩，走陶潜一路，诗歌风格意趣淡远、平易率真，多以田园野趣为题材，往往透出隐居避世思想，但在当时诗坛上没有发生影响。

初唐后期，标志着诗风转变的代表人物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他们的诗虽然还没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但变革是其主导方面。初唐四杰的诗歌“正如宫体诗在卢（照邻）、骆（宾王）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勃）、杨（炯）的时代是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比初唐前期的诗歌题材明显扩大了，开启了一代诗风。骆宾王的《咏鹅》相传是七岁时所作，饶有童趣。骆宾王的近体五律《在狱咏蝉》以蝉自喻，堪称咏物诗的绝唱。卢照邻的七言长篇《长安古意》通篇格局雄远，句法奇古。王勃的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唐诗三百诗》陈婉俊补注）。王勃的七律《滕王阁》，俯仰自在，流丽雄

健，“似歌行中律体”（《诗薮》）。陈子昂对扭转诗风的作用比初唐四杰更大。他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明确的诗歌主张。他标榜“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歌内容的革新。他的五言古诗寄兴遥深，如《感遇三十八首》等。和初唐四杰、陈子昂大体同时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在诗歌格律、体裁的定型化和诗歌艺术的提高上，也做出了贡献。如沈期的七律《独不见》，宋之问的五律《度大庾岭》，杜审言的排律《赠苏味道》等。与沈、宋同时的还有刘希夷，他的代表作《代悲白头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为人传诵。

2. 盛唐诗坛概况

诗歌史上的“盛唐”是指从开元初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2—765）这一时期。这半个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盛唐诗坛虽仅 50 余年时间、6000 首左右的存诗，但却产生了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代表李白、杜甫。这个时期以李白登上诗坛前期开始，以杜甫行将逝世结束，实际上不妨说就是李白、杜甫的时代。这个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高适、王之涣等十多位艺术成就很高的诗人，除山水诗外，其他如友情、送别、行旅、宫怨、咏史、咏物、登临、怀古、隐逸等，均有题咏；就艺术上看，上述诗人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以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揭露批判，对封建礼法的蔑视反抗，奏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风格奔放自然，色调瑰玮奇丽，想象夸张丰富，节奏变幻莫测，是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乐府与歌行打破了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随心所欲，流畅奔放。如《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梁甫吟》《扶风豪士歌》《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作品大开大合，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固有格式，呈现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李白的绝句超妙俊逸，风神爽朗。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山中问答》等。李白的诗歌极富艺术个性，突出地表现在带

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从不同角度迅捷、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尤其以“新闻快递”的形式全面展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面貌。他创作了大量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悯民、爱国、忠君思想在诗中有充分的表现：真诚、深厚、强烈。杜甫作为诗人，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万方多难的社会背景下，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他具有现代职业记者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敢道，不论是远闻而赋，还是近睹而作，皆能关注时事，捕捉热点，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本质。他采集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范围之广、角度之新，前所未有。杜甫诗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缘于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其诗的内在特质；同时也与他了解社会、反映现实的方式有关，这是外在的表现。杜甫在继承前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熔述志抒怀、叙事绘景、纵横议论为一炉，将个人经历遭遇和时事政治、人民生活融为一体的现实主义叙事长篇。另一方面，他又创造出了“三吏”、“三别”这种迅速反映时事而又有很高典型性的叙事诗，这是诗歌史上的一个创举。杜甫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在诗歌艺术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如《秋笛》《即事》《王命》《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杜甫诗思想深厚博大，感情深沉凝重，意象雄浑苍茫，表现手法沉着曲折，结构波澜起伏，意境崇高悲壮，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

盛唐前期（开元初到安史之乱，712—755）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这一时段诗人众多，诗歌艺术达到高度纯熟，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浪漫（理想）主义，由于创作题材、倾向、风格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大的诗歌流派。边塞诗派，是以岑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人为代表。这一派诗人最优秀

的诗篇多半是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的。浪漫主义色彩很浓，风格雄健，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他们最擅长的是七古，其次是七绝。

岑参边塞诗的艺术风格，可用一个“奇”字来概括。他的边塞诗充溢着浪漫主义的奇情壮采，着意表现边塞的奇特瑰丽的自然风光，不仅是行军、战斗、火山、热海等事物被表现得十分雄奇瑰丽，就连边塞的日常生活也被描绘得新奇、浪漫而富于诗意，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奇”是贯穿他诗歌题材、思想内容、体裁、格律、手法、风格的基本要素。

比起岑参的边塞诗，高适的边塞诗没有那样丰富多彩的色调，那样充溢着豪情壮志，那样富于浪漫情调，但却有充实的社会内容，更深刻的思想，更深沉的感情。如《燕歌行》能够揭露军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为代表，这一派诗人擅长写宁静明秀的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情趣，风格比较含蓄清淡。多用古体，特别是五古。他们在表现自然美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王维、孟浩然的隐逸情结、禅宗思想对山水诗境的创造有很大的意义。如《夏日南亭怀辛大》《春晓》《宿建德江》《耶溪泛舟》《山居秋暝》《山中》《终南山》《辋川集二十首》等。

3. 中唐诗坛概况

诗歌史上的“中唐”是指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唐敬宗宝历二年（826）这一时期，历时60年。据《全唐诗》统计，中唐时期远远超过了“初”“盛”“晚”各个时期，比“初”“盛”唐的总和还多。这一时期诗歌流派众多，各种艺术风貌纷呈，充满着革新精神。这是继盛唐之后，诗歌发展的又一繁荣时期。

中唐时期诗歌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大历到贞元，这是由盛唐向中唐的过渡时期，习称大历时期（诗坛）；第二阶段是从贞元至宝历

末，这是唐诗发展的新变时期，也是中唐诗歌发展高潮时期，习称元和时期（诗坛）。

中唐前期，即大历时期，诗风已开始发生变化，唐李肇指出：“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元和之风尚怪也。”（《国史补》）从中唐诗歌发展总的倾向来看，这个概括大体准确。安史之乱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诗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受到沉重打击。茫然无措、苦闷彷徨地哀吟，或遁入山水，歌咏隐逸以逃避社会现实，或战乱刚定而为一己之利去歌功颂德是这一时期诗人们在时代灾难面前的重要表现。当然此时也不乏清醒者，他们对动乱的时代有深刻的反映。

分别地看，大历诗坛有鼓吹振兴风雅，注重反映民生疾苦的元结、顾况等，有以应酬唱和相呼应的大历十才子等，还有侧重写游历山水、隐居田园、遭受贬谪的刘长卿等。韦应物是这一时期的特殊存在。元结、顾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诗人（特别是元结）复古不知通变，拒绝用顺乎潮流的诗歌体式反映生活，因此其诗形式古奥，可读性不强，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诗的共同特征是情调凄凉感伤，未能及时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大历十才子，还以诗为应酬工具，因此人们目为浮薄。但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形式技巧，特别是近体诗，形式工整，语言炼饰，技巧纯熟，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典型地代表了大历诗风。韦应物的诗既与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古风派”不同，也与以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入时派”不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气貌的清朗温润，意境的淡远超诣，表现手法的淡然无意，艺术效果的入微而不见其工，节奏的舒缓不迫是韦诗区别于大历时期其他诗人的主要风格特征。大历时期还有李益较有成就，他擅长边塞诗的创作，其中有的慷慨激昂，但总的基调是悲凉的。

元和时期是中唐诗歌发展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渐趋安定，经济也逐渐得到恢复，给人们带来中兴的希望；另一方面，安史之乱留下的后遗症，

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阶级、民族矛盾的加剧等，使有识之士清醒地面向了现实。这些社会因素，对中唐诗坛有着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元白、韩孟、刘柳、李贺等著名的、有特色的诗人和流派，诗风大变。

白居易、元稹在杜甫、元结、顾况等用新题乐府诗批判黑暗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基础上，与张籍、王建、李绅等前后呼应，在理论上更加明确地进行鼓吹，在创作上大力实践，终于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这场现实主义诗歌革新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他明确地提出了系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强调发挥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的艺术表现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通过平易通俗的语言表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愿望。他还为新乐府诗规定创作方法：“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是其理论主张的具体实践。元白诗人的诗歌内容以讽喻时政、反映民生疾苦为主，风格浅切通俗，平易流畅，容易被人接受。韩愈、孟郊、贾岛等韩孟诗派诗人，力图打破诗歌内容、形式上的妥贴和谐的传统美学规范，把散文的笔法、音节、章法带入诗中，表现出雄怪奇崛的艺术风貌。他们敢于把怪诞、凶狠、丑陋、苦涩、寒瘦等前人不写的内容写进诗中，敢于用怪字、奇字、僻字，怪句式，怪句法，不忌诘屈聱牙；对仗、音律上避免对称和谐。韩孟诗派诗人“险语破鬼胆”，有意违反传统，立志改革诗体，为唐诗之一大变。元白诗派诗人诗歌平易通俗，韩孟诗派诗人诗歌奇险入怪，艺术风貌不同，但两派诗人都富于革新精神，他们的创作，是中唐诗歌繁荣的标志。同时，他们也有不成功的教训，词繁意露，穷形尽相，缺少情韵是他们的共同倾向。

刘禹锡、柳宗元别于上述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其诗善于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开拓新面。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是文人诗和民歌有机结合的产物，其政治讽刺诗颇具锋芒，怀古诗历史鉴式之意较深。气雄沉着，婉转多讽，构成了其诗的主要风格。柳宗元山水诗表现出清峭峻洁的风格，其五言诗高古疏简中寓有幽愤之情，表现出独特的风格特征。在诗中抒发强烈的政治感受是刘禹锡、柳宗元的共同特征。

中唐后期，李贺诗在韩孟等诗人写怪奇的基础上，将反映生活的触角延伸到“鬼”的世界，形成虚荒诞幻、幽怪奇丽的风格特征，是韩孟诗派中艺术成就较高、刻意追求新奇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中唐时期因都市的繁华，社会上层日趋浮靡，也使香艳题材的创作有了生活基础。晚唐香艳诗大盛肇自中唐，元稹、李贺都有香艳之作，是开风气的诗人。

4. 晚唐诗坛概况

晚唐诗坛（从唐文宗大和初到唐末，827—906）晚唐前期（从文宗大和初到宣宗大中末约30年，827—859）。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还有温庭筠。他们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特色和贡献。

李商隐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其诗反映了没落衰颓的晚唐王朝政治生活及社会面貌，尖锐地揭露了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表达了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精辟见解，同时也表现了被压抑的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及心理。在传统的习见的题材中寄寓深刻的思想，在旧有题材中翻出更高层次的意蕴来，这似乎是李商隐对诗歌题材发展的最具个性特点的贡献。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爱情诗为其重要的诗歌题材。李商隐诗深情绵邈，精丽而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擅长于朦胧意境的创造和感伤情绪的表达。如《春雨》《锦瑟》“无题”等。

杜牧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伤春伤别”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两大基本主题。所谓“伤春”，就是感伤时事，为唐王朝的衰落，为当时政治、军事上的各种黑暗腐朽现象而感伤、慨叹。所谓“伤别”，就是自伤身世遭遇，为个人的怀才不遇而慨叹。杜牧古体诗豪健跌宕，骨气遒劲，如《郡斋独酌》《感怀诗》《雪中书怀》等。近体诗情致俊爽，风调轻利，七绝尤为人所

称道。诗人或写景抒情，或怀古咏史，或情致豪迈，议论精警，风格俊爽，虽带有感伤的时代色彩，但风华流丽，韵味隽永。如《河湟》《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赤壁》《山行》《秋夕》《赠别》《江南春》《泊秦淮》《过华清宫》等。

晚唐后期（从懿宗咸通初到唐末，860—906）这一时期，唐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特别是黄巢起义失败后，国家分裂，军阀横行，诗人生活中已失去理想希望。但当时有一部分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如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他们这些诗虽然也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但既缺乏深沉博大的精神，又缺乏海含地负的才力。此外，较重要的诗人还有韦庄、司空图、韩偓等。